

宋朝时期,海南岛与山东沙门岛并称为两大贬官目的地,因此有大量官员因各种罪名被贬谪到海南。而这些贬官们在到海南岛时,必须要渡过琼州海峡。对于千年农耕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原人士,很少能有机会与海洋接触,更何况是要乘船渡海。因此,横渡琼州海峡往往成为他们贬谪途中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段路程,现实的波涛与五味杂陈的思绪,往往交杂成一个个块垒,必须吐之而后快。宋代对贬官有相应的恩宥制度,除了死罪和永不放还者外,每遇大赦就会得到赦免,这样就使得他们有了第二次渡海的机会。因此,很多贬官在渡海前后常常会抒发自己的感慨,表达不一样的人生思考。因此,就有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小门类:渡海诗。

为此,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郭庆财专门撰文《论宋代海南谪宦的渡海诗》,介绍了宋代贬官所作的渡海诗。据他介绍,仅宋代贬官们留下的渡海诗就有20余首之多,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与海相关的诗作。

# 宋代贬官的渡海诗

文|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

南下渡海,是由已知世界向未知世界的过渡,意味着远离中原文明、孤独困守的遥遥无期;北上渡海,则是海外生死考验的结束,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的解脱。南渡和北归,是生命的沦落与回归,形成了自由和羁束的强烈落差。因此宋代谪宦在渡海这一生死之际的转折中,激发起对人生、命运的终极思考,也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心态。这在他们的渡海诗中皆有所体现。

## 渡海惊魂先祭海

郭庆财认为,从地理环境上来说,海水的阻绝和分割,对谪宦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:海南海北在自然环境、风土民情方面有着巨大差异,亲情、友情、各种讯息也为海峡所阻隔,他们常常怀有能否生还北归的疑惧。除此之外,惊险的渡海本身也是一道“鬼门关”。面对茫无际涯的凶险海潮,他们难免忌惮。苏轼在《伏波将军庙碑》中写道:“自徐闻渡海,适朱崖,南望连山,若有若无,杳杳一发耳。舫舟将济,眩栗丧魄。”

宋朝时,海南贬官们一般都是由雷州半岛渡海到澄迈。《舆地纪胜》称朱崖“与徐闻对渡。北风举帆,一夕一日而至。”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,使得流滴之人南渡时常有风波之灾。关于琼州海峡的凶险难渡,相关史料多有描述。北宋初期就有记载称“先是岁调雷、化、高、藤、容、白诸州兵,使犂军粮泛海给琼州。其兵不习水利,率多沉溺,咸苦之。”为此,琼州海峡一带形成了浓厚的海神崇拜情结,贬官们也大多不例外。

唐代刘禹锡、李翱、李商隐等皆有祭马伏波庙文。不过,他们祭祀的目的仅在发抒贬谪之恨,这也是唐代歌咏马援的主旋律。宋代苏轼、李纲、李光等名宦祭伏波庙,则是敬人和敬神的统一,是集凭吊和祭祀行为于一的。他们耿耿孤忠的人格精神、遭谗被谤而沦落的境遇与马援颇为一致,故多借祭海发抒不平之鸣。苏轼赞马援曰:“生为人英没愈雄,神虽无言意我同。”

李纲诗中也表达了与马援这位失路英雄的惺惺相惜:“戈缸下濂勋猷壮,马革裹尸心胆雄。顾我迂疏成远谪,赖神正直鉴孤忠。”凭吊先贤,向海神马援表白自己的心迹,有藉以浇平胸中块垒之意。

祈神祭海,与海神精神的冥会,也给了他们平安渡海和顺利北归的双重精神支撑。因此他们在祈神顺风后,相信神灵确能助人化险为夷,归心中的欣悦可知。苏轼、李纲南渡与北归之前皆曾祭海且卜筮,李纲卜以11月25日南渡,一卜即吉,“乃知



万宁东山岭上的李纲雕像。王凯 摄

儋州东坡书院里的苏轼雕像。李幸 摄

神之威灵,盼昭著若此。”正是缘于此,李纲虽乘船南下,却模仿东坡北归渡海之作,以啸傲沧海的精神压倒了恐惧:“夜半乘潮云海中,伏波肯借一帆风。满天星月光铓碎,匝海波涛气象雄。大舶凭陵真潏渺,寸心感格在精忠。”

郭庆财表示,对神灵的敬奉和祈求,源于贬官们现实中的无能为力。因此,对深感人事多难、命运渺茫的贬官而言,祭海予其精神的寄托和慰藉,使忧愤、恐惧转为平和与旷达。从渡海之际祈神卜筮的茫然,到祭后迎来风平浪静、水云遄飞的欣悦,明显可以感受到从“惶惑”到“平和”的心理起伏,也体现了他们在茫然无助之余自我调节的努力。

## 乘桴浮海却宽心

虽然前途的吉凶莫测让谪宦内心充满不平 and 忧惧,这由贬官们对大海惊涛骇浪的恐惧中隐约可感;但同时浮于江海,远赴天涯,也意味着士人对险恶政治生活的远离和“江海之志”不期而然的实现。因此他们诗中亦多有对浩淼大海的亲近。

苏轼与大多数南宋海南谪宦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人生情怀,即对孔子“乘桴浮于海”精神的认同。海南贬官大多因为政治斗争落败而被谪,渡海之际,孔子“乘桴浮于海”的理想在他们那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。苏轼将此理解为出尘高蹈,避世隐居。他在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中写道:“空余鲁叟乘桴意,粗识轩辕奏乐声。”郭庆财认为,随遇而安,随宜所适,是苏轼和海南贬官们淡化痛苦、超越苦难的一种可贵的豁达,一种超然的道家智慧。这不但在士人渡海时形成内外映照,而且与其身处海南时的个人出处思考相一致。将个人生命置于宇宙背景之中来审视贬谪南海,使他们不再执着于个体生命存在,而是超然物外,淡化距离远隔带来的痛苦。苏轼即深受庄子齐物思想的影响,从而抹平海南海北的限



古代贬官渡海路线图。单憬岗/绘

隔,“吾道无南北,安知不生今。”因而进入海南和出离海南也并无本质区别,放逐虽是失,亦未必无所得。正是因为这样,苏轼北归时才有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坦然和豪迈。南宋的贬官们学习苏轼,对被贬谪有了苦难的免疫因子。如胡铨就写下:“仲连蹈海徒虚语,鲁叟乘桴亦漫谈。争似澹庵乘兴往,银山千叠酒微酣。”

李光也写下:“须知鲁叟乘桴兴,未似商岩济巨川。”李光的人生精神最接近于苏轼,他此前已被谪藤州3年之久,认为只要不执著于政治得失,不计较南北距离,以佛道的平等观视之,则来亦不惧,去亦欣然。因此南渡时,才有“三载藤江守药炉,身轻那复羡飞凫”的洒脱和超然。

## 身在江海存魏阙

郭庆财表示,被放逐于江海,既可以像孔子一样,怀有一种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的潇洒;也可以“身在江海,心存魏阙”,即眷念朝政,矢志不渝。北宋贬官大多是第一种,如丁谓:“今到崖州事可嗟,梦中常若在京华。”而任伯雨《述怀》则昭示了其忠心谋国的一腔血诚:“雅有江海志,仕宦特牵迫。一日偶遭际,用舍何敢必。但思忠邪分,于国系休戚。周髀不恤纬,我意何穷极。漆女倚门啸,我情第埋郁。呜呼谋身者,所宜念阴默。”虽投荒万里之外,而无个人生死之恤念,更多的是伤离之感和对朝廷失政之忧念。

同是渡海北归,与苏轼不同。身处北宋即将灭亡之际,他面对多艰的国运很清醒,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忧心。他豪迈的人格境界以国运的担当为内核,而又表现出潇洒超拔的精神超越。他的渡海诗写道:“平生奔走畏江湖,暮齿来乘海上桴。自哂井蛙真见小,望洋向若一卢胡。”

因此,李纲这种“身在江海,心存魏阙”的忧患精神既不同于悵愤填膺的任伯雨,更与自安自适的李光形成了很大的反差。李纲北归后,即被除命湖广南路宣抚使,乃有诗云:“龚遂有心安渤海,谢安无计恋东山。”回头再看李光被谪海南昌化时的一首诗与之相应和:“胜欲哦诗追沈谢,不求名迹拟龚黄。”这样看来,李纲以谢安和龚遂自命,不愿贪恋安适的家园,而欲身赴国难。

“不同的贬谪经历和自我修养,影响到宋代贬官们对世事的热心和淡漠,也使得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江海。虽然个人出处的思考不同,而李纲、李光皆不乏乐观、旷达的精神气象,这在渡海诗中已经显出端倪来了。”郭庆财说。

